

《延安歸來》與新聞出版自由

• 丁 東

1945年7月，黃炎培等六位國民參政員應邀訪問延安。後來，黃炎培將他訪問延安的日記編成《延安歸來》一書，以國訊書店的名義在重慶出版。現在，這件事經常被人們提起，原因是黃先生在延安與毛澤東有一番關於民主的對話。黃炎培說：

我生六十年來，耳聞的不說，所親眼看到的，真所謂「其興也勃焉」，「其亡也忽焉」，一人、一家、一團體、一地方、乃至一國，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。

他希望中共諸君能找出一條新路，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。毛澤東當時回答說：

我們已經找到新路，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。這條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鬆懈。只有人人起來負責，才不會人亡政息。

毛澤東的確答得很好。遺憾的是他並沒有真正實行，所以也沒能跳出周期率的支配。到底是毛澤東自食其言，

還是他對民主政府的理解本身就不到位？這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歷史課題。半個世紀過去，撫今思昔，這件事耐人尋味是理所當然的。

而我想說的是，黃炎培這本書在當時還有一個直接後果，現在不常被人們提起，其實也很有意思。

國民黨政府以抗戰為由，於1938年7月頒布了《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》，規定報刊、雜誌、圖書的原稿必須經「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」檢查通過後才能發稿排印。而一經所謂「檢查」，文章被刪的刪、改的改，面目全非。有的報刊雜誌乾脆出現了天窗。准此，《延安歸來》如果送審，勢必難逃厄運。因此，黃炎培與人商量後，決定衝一衝這禁區，不送審出版。1945年8月7日《延安歸來》出版發行，馬上遭到特務搜禁。當時正好趕上抗戰勝利，所謂「戰時」已經結束。於是，由張志讓、楊衛玉、傅彬然起草了〈重慶雜誌界拒檢聯合聲明〉，章伯鈞主編的《中華論壇》、孫科所辦的《民主世界》、左舜生主編的《民憲》、張西曼主編的《民主與科學》、葉聖陶主編的《中學生》、侯外廬主編的《中蘇文

化》、曹孟君主編的《現代婦女》等十六家雜誌參加簽名，於8月17日發表。聲明宣布：自9月1日起，雜誌不再送檢，並函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、憲政實施協進會和國民參政會。當時，重慶不過三四十家雜誌而已，這十六家幾乎佔了一半。接着，《憲政》、《國訊》、《中華論壇》、《民主世界》、《民憲》、《再生》、《東方雜誌》、《新中華》、《中學生》、《文匯周報》十家雜誌又在9月15日聯合推出增刊，宣布：一、不向國民黨政府辦理登記手續；二、稿件全部不送檢。葉聖陶當時還發表了我們永不要「圖書雜誌審查制度」的文章，他說：

要審查就得定出個標準與尺度來，思想言論要合得上標準和尺度才可以發表，就等於有一部分思想言論不能發表，就等於不讓大家盡情發言，仔細思量，這成甚麼話。

重慶雜誌界拒檢，引起了連鎖反應。成都十六家報紙、雜誌、通訊社也發表公開信予以響應，信中說：

我們因為八年來身受檢查制度蹂躪的痛苦，決心使檢查制度從此永遠絕迹，永遠不在中國領土的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復活。——除了一般應該遵守的刑法規定以外，我們將反對一切限制人民言論自由的法令和制度的產生。言論自由必須完整的，兼收並蓄不能是殘缺不全的，或僅僅為一黨一派所享有的特權。

接着，昆明、桂林、西安等地報刊、書局、通訊社也紛紛成立聯誼會，響應拒檢。迫於形勢，國民黨中常委總算在9月22日通過決議，宣布從10月1日撤銷對新聞和圖書雜誌的審查。

這一次，知識界的表現和當局的表現都值得稱道。就知識界而言，這些期刊分屬不同黨派，有不同的政治傾向、不同的專業性質，但在爭取新聞出版自由的理念上卻達成高度的共識，於是攜手向檢查制度挑戰，並一鼓作氣，取得成功。不論是行動的果敢、合作的默契，還是理念的先進、道德的勇氣，今天中國期刊界總編們都應自愧不如。

就當局而言，在彼時彼地，雖然並不十分情願，行動也略嫌遲緩，但總算能夠棄惡從善，順應文明的潮流。其實，現代政治文明的進步，很多都是妥協的產物。政治家的高明之處，有時並不在於他有多麼強硬，敢於大打出手，而在於他能夠在歷史的關節點上，超越傳統的羈絆，通過妥協，和平地步入新的格局。

雖然這種格局延續的時間不長，隨着內戰爆發，國民黨當局以勘亂為由，又拾起了不得人心的審查制度。但中國總算出現了新聞出版自由的難得一瞬。如果哪位有心人統計一下，就會發現在這一瞬之間面世的思想財富是何其質高量多！當二十世紀就要結束的時候，回首百年，人們不禁發出這樣的感慨：這樣的一瞬太少了，太寶貴了。

重提這段往事，不是希冀哪位領導開明，再度恩賜自由的一瞬，過把癮就死。在新的世紀，中國知識界是否應當找回曾經擁有的先進理念和道德勇氣，通過不懈的努力，讓自由的一瞬成為常規秩序呢？

丁 東 大陸自由撰稿人